

广西柳州华侨农场归侨的经济适应研究

罗家珩

(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6)

[摘要] 柳州华侨农场前身系农垦系统始于1958年的国营东泉农场,原隶属于农垦系统。1960年4月接收从海外归国的华侨华人后更名为“广西国营柳州华侨农场”。农场归侨在归国后经历了从艰难适应、适度调整、逐步适应到主动融入等阶段,这一发展经历决定了归侨经济生活的适应水平。他们在特定的发展语境中不断适应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环境,紧跟时代发展的步伐,赋予不同历史发展时期群体经济适应的动态特征。

[关键词] 归侨;农场;经济适应

[中图分类号] D63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3925(2022)02-0025-10

人口迁移一直是各国学界关注的重要社会发展问题。关于中国人口迁移的问题,世界各国学者的相关研究著述颇多,如经济学、政治学、人口学、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等多个学科纷纷关注到中国人口迁移问题。目前,中国出现的移民潮主要有三种:一种是大量的边民从祖籍国迁移到毗邻国家的城市地区;一种是中国内地各城市的人口迁移到海外各国;还有一种是从祖籍国迁出—回流—再迁出—再回流的循环反复的迁移过程。国内学界关于国际人口迁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移民的迁移动因、移民路径和社会适应等方面,而对移民回流后的经济适应过程较少关注。中国作为世界主要的移民来源国之一,近些年来,中国的海外移民潮在持续扩大的同时,也带来大量的海外移民回流,究其原因,主要有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方面的原因,也有主动与被动的因素。从目前国内研究的现状来看,关于海外移民回流问题的研究,其研究对象主要集中于归国留学人员、归国高校教师,而对一般的移民归国后的相关研究较少。归国华侨(下文简称“归侨”)是我国近代以来,尤其是1949年之后一个较为特殊的群体,这些群体在回国适应新环境的过程中,通常会遇到思想观念、经济生产、日常生活等诸多方面的压力和挑战。人类社会的文明和发展都受到他们身处其中的物质条件的限制,这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共同特征,所有的社会及其群体都受其经济因素的影响和限制。因此,笔者试图从归侨对社会经济发展的适应情况来探讨民族学、人类学研究领域的相关问题,以供学界同行参考,共同推进人口迁移的相关研究。

[收稿日期] 2021-12-02; [修回日期] 2022-03-20

[作者简介] 罗家珩,江西赣州人,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民族学系教师、博士,助理研究员,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国南方与东南亚地区民族历史文化。

[基金项目] 本文为2020年广西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研究课题“广西海外新移民故土实践的人类学研究”(项目编号:20FMZ029),2019年广西民族大学引进人才科研启动项目“中蒙边境哈萨克族传统节日文化功能研究”(项目编号:2019SKQD15)阶段性研究成果。

近些年来,中外学界对于归侨群体的研究较多,国外具有代表性的论著主要为加拿大学者格兰·彼德逊在其著作《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归侨》中论述1949年以后中国的侨务政策以及相关优待政策对归侨的影响^①;Christel Kesler关于归侨侨眷在国家扶贫政策的背景下发展情况的研究^②。这些研究成果为我们研究归侨、侨眷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路和方法。与此同时,国内学界也有不少同仁基于移民和归侨、侨眷的主题进行研究,值得关注的有郑一省的《东南亚华侨华人、港澳同胞与侨乡建设——梅州市个案研究》^③、《广西华侨农林场、归难侨安置点——文化人类学研究的“理想实验室”》^④、《广西侨乡文化与华侨华人文化互动研究》^⑤等。郑一省教授基于华侨农林场、归难侨安置点的调查,分析和探讨归侨的认同感、侨乡社会经济发展以及华侨华人与侨乡文化的互动等相关问题,这一研究视角启发了我们思考归侨、侨眷和侨乡发展研究的路径。此外,还有孙东波^⑥基于云南锡业公司归侨的生活生产状况,分析归侨群体对新社会环境的适应问题;卢鹏^⑦以河口归侨群体为例,对其形式、社会适应和事业发展进行相关研究;李妮娜^⑧以广西东兴镇的散居归侨群体婚姻的择偶观念、方式和婚姻类型为研究方向,探讨当地归侨婚姻变迁的相关问题。由此可见,学界从民族学、人类学视角来探讨归侨经济适应的研究尚不多见,尤其是对广西华侨农场归侨经济适应的相关研究屈指可数,很值得进一步研究。有鉴于此,本文以广西柳州市柳城华侨农场归侨为个案,对归侨回国后的经济适应过程进行较为深入的探讨。

一、柳城华侨农场的田野调查

广西是中国的重点侨乡之一,广西人出国历史悠久,人数众多,分布较广。主要居住在东南亚及欧美地区,尤其以越南、印度尼西亚(下文简称“印尼”)、泰国及美国较多。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有10万余海外华侨回到广西^⑨,广西籍华侨回国有其不同的原因,主要有家人团聚、服务祖国、安度晚年以及其他一些特殊的原因。20世纪50、60年代,广西主要接待安置越南、印尼及泰国等地归侨,大部分归侨集中安置在华侨农场和国营农垦农场,少数归侨原籍在农村且有亲人又要求回原籍安家的,当地政府妥善安排其回原籍。柳州市的归难侨主要来自印尼、越南、马来西亚、柬埔寨和印度等国家,集中安置在市区、市辖区和市郊的5个厂(场)。当地的归侨、侨眷以及港澳同胞的海外亲属分布在47个国家和地区,人口约8万人,其中约有4万人分布在东南亚各国以及欧美等国家^⑩。1978年以来,柳州市积极开展与海外华侨华人以及港澳同胞的联谊活动。每逢佳节,柳州市都会邀请海外华侨华人以及港澳同胞的知名人士来柳州进行参观、旅游、举行座谈会以及联谊活动,增进其对柳州的了解、经济合作和文化交流。有鉴于此,笔者于2021年在广西柳州市柳城华侨农场进行实地调查,对生活在那里的归侨进行了访谈。访谈主要围绕这些归侨的生产生活、节日习俗、文化认同等问题,了解当地归侨回国后的社会、经济和文化适应状况,对当地归侨及

①[加]格兰·彼德逊,张茂荣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归侨》,香港:印尼民族建设基金会-香港印尼研究学社,2007年版。

②Kesler C. Welfare states and immigrant poverty: Germany, Sweden, and the United Kingdom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Acta Sociologic.* 2015.

③郑一省、赵利屏:《东南亚华侨华人、港澳同胞与侨乡建设——梅州市个案研究》,《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1年第2期。

④郑一省:《广西华侨农林场、归难侨安置点——文化人类学研究的“理想实验室”》,《八桂侨刊》2012年第2期。

⑤郑一省:《广西侨乡文化与华侨华人文化互动研究》,《八桂侨刊》2007年第2期。

⑥孙东波:《云锡公司印尼归侨社会适应研究》,《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9年第4期。

⑦卢鹏:《河口归侨群体的形成社会适应与事业发展研究》,《八桂侨刊》2011年第3期。

⑧李妮娜:《散居归侨的婚姻变迁研究——以广西东兴镇为例》,《思想战线》2011年第2期。

⑨⑩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广西通志·侨务志》,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页,第229页。

其第二代的经济适应模式和机制等相关问题进行微观分析。

(一) 柳城华侨农场的历史与现状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国家崭新的面貌吸引了大批的海外华侨华人归国安家立业。20世纪60、70年代,由于政治、经济等因素,印尼、越南等东南亚部分国家相继爆发大规模的反华排华事件,大批华侨被迫迁离经营了几十年的家园,离开侨居国,踏上了回归祖国之路。华侨农场也就是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创办,国家为了安置归侨回国定居设立了国有农业企业。柳城华侨农场地处桂中北部,介于柳城、鹿寨两县之间,成立于1960年4月,前身系农垦系统始建于1958年的国营东泉农场,原隶属于农垦系统,1960年4月接收从海外归国的华侨华人后更名为广西国营柳城华侨农场,是柳州市最大的归侨居住地,也是广西六个最早的老华侨农场之一。1960年4月和1978年先后安置了大批印尼、越南、缅甸、马来西亚和印度的归侨^①。

农场成立初期隶属于中央华侨事务管理委员会和自治区华侨事务委员会。1970年后由柳州地区专署和自治区农垦局管理。自治区侨务部门恢复后,1978年6月归口为自治区侨务管理办公室直管,1981年广西华侨企业管理局成立后,协同自治区侨务办公室在业务上对农场进行指导与管理。1998年9月农场下放由柳州市人民政府管理。2002年11月划归柳城县人民政府管理,2003年5月成立柳城华侨经济管理区,2014年12月改为柳城华侨管理区,2017年6月列入柳州市北部生态新区规划范畴。农场总人口6212人,归侨侨眷4042人(其中:印尼归侨648人、越南难侨1784人、侨眷1610人)占农场总人口的72%,他们大多数都是来自印尼、越南等国的归侨,与全世界24个国家和地区的华侨华人有亲缘关系,是柳州市规模最大、人口最多最集中的归侨、侨眷居住地。农场现有在职职工357人,离退休职工1275人。农场下设三个作业区,内设13个分场,2个并场村以及1家茶厂^②。

从1960年起,柳城华侨农场分批安置印尼归侨,兴建宿舍,学生安排在当地学校进行插班学习。为解决归侨回国后的生活困难,从1961年起,政府每年拨款数万元,对农场家庭生活困难的归侨给予定额的补助。同时,对归侨的工作安置也在不断地进行调整,很多归侨被安排在农场内的机关、学校或场外的其他单位工作。从1965年起,该场全面开展资源调查,制定相应的发展规划,因地制宜地种植茶叶。1967年,该场筹建茶厂,到1968年,茶园发展到200公顷^③。1979年,农场调整经营模式,重点发展茶叶生产,将水果种植当作二线作物扩大生产,并开始实行“三定一奖”的管理办法。1985年,该农场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茶叶种植的发展逐渐加快。1988年,该农场兴建第二茶厂,并逐渐开始实行场长责任制,茶园和果园的单位面积产量和总产量都居广西华侨农场前列。

(二) 柳城华侨农场归侨的类型与文化

柳城华侨农场归侨的祖辈大部分都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移民海外的,他们大多数是来自福建省福清市、连江县、惠安县,广西防城港市、东兴市、钦州市,海南省以及广东省等地,他们在东南亚国家生活了上百年或者几十年不等,并在居住国积累了大量的家产和社会关系。直到20世纪50、60年代,印尼、越南、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先后发生“排华”事件,他们迫于无奈选择回国,并开始新的生活。柳城华侨农场1960年以后的归侨是在两个不同历史时期从不同的居住国回到祖国的。第一次华侨回国的高潮是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这个时期的归侨主要是印度和印尼归侨;第二次华侨回国的高潮是1978年后,这个时期

^①柳城华侨农场共13个分场,其中有4个分场于20世纪50、60年代为安置马来西亚、印尼、缅甸以及印度等国家的归侨而设立,全场主要安置的是越南、印尼等国家的归侨。

^{②③}该数据来源于作者2021年10月田野调查的统计结果。

主要是来自越南的难侨。据农场归侨 QLX 回忆^①,华侨在越南和印度尼西亚居住较为集中,通常都是聚居在一个村落,平时都是以客家话、白话或西南官话进行交流。华侨和越南、印度尼西亚本地人关系较为和谐,日常节庆都会互赠礼物,但较少与当地通婚,都是在华侨之间通婚。早期的越南和印尼华侨的教育相对落后,大部分华侨没有接受华侨学校的教育,而是在当地人建立的学校就读,且只接受小学、中学的教育,因此早期华侨的文化程度初中以下(初中、小学、文盲)约占 90%^②。在柳城华侨农场,来自不同国家的归侨都生活在此,多元文化交流共融,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东南亚文化风情。由于越南和印尼的归侨人数较多,越南和印尼的风情文化较为突出。农场的越南归侨曾居住在越南北部山区,在文化传统方面,与祖国儒家文化核心理念差别较大,但他们在生活生产方式、节日礼俗以及语言使用等方面仍然保留着广西地区的传统习俗。

二、归国安置初期的艰难适应

从 1960 年到 1978 年,柳城华侨农场开始分批接收来自印尼和越南的归侨^③。在印尼和越南归侨到达广西之初,他们首先遭遇了对地域的不适应以及对国内外的生活生产环境差异感知较为强烈等方面的严峻挑战。

其一,对安置点地理及生态环境差异的挑战。柳州市地处广西中北部,属中亚热带季风气候,夏季时间较长,冬季时间较短,气候常年潮湿炎热,雨热同季。但地区差异较大,柳州北部地区具有较为明显的山地气候特征,太阳辐射量较大,日照时间长。而这种生态环境与东南亚华侨长期生活的山地气候完全相左。一方面,柳城华侨农场归侨因为气候不适应,缺乏相应的经验和常识,在归国初期经常出现身体不舒服的现象,并且还时常受到蚊虫叮咬,农场职工医院也经常处理归侨这些问题。另一方面,当时广西各地区的交通状况和基础设施正处于建设阶段,与周边各省市的城市建设存在较大的差异。据当地越南归侨回忆,当时他们回国是先在广西防城港的集中安置点等待统一安排,当地政府将越南归侨主要安置在福建、广东和广西等地的华侨农场。当时和他们同批回国的归侨都希望自己被安排到福建和广东华侨农场,他们认为当时广西的社会发展水平和福建、广东存在一定差距。但是部分归侨被安置在广西后,由于不满意这样的安排,又选择回到防城港集中安置点等候重新安排,最终较多的持有这类心态的归侨都被安置到广东的华侨农场。因此,该农场归侨在回国初期对安置点的基础设施建设存在不适应。安置点的地理及生态环境差异对归侨所造成的冲击,包括了其身体、心理以及日常生活习惯等方面,进而形成了他们对当地环境认知和资源利用的障碍。

其二,对安置点生活生产方式转型的挑战。据当地越南归侨 MLS 回忆^④,越南归侨大部分是居住在越南北部山区的村落,生活条件相对方便和优越,并且已经非常习惯越南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由于当时越南政府计划将居住在这片山区的华侨安排至越南中部地区(气候炎热、潮湿,多为沼泽地带),大量居住在越南北部的华侨就开始陆续回国。据调查,当地农场印尼归侨归国前主要是做生意或在种植园务工,而越南归侨主要是从事农业生产。然而来到柳城华侨农场后,归侨必须适应当地的生产劳作方式,学习和掌握

①被访谈人:QLX,36岁,汉族,柳城华侨农场印尼归侨。访谈时间:2021年10月。

②该数据来源于作者2021年10月田野调查的统计结果。

③现今学界关于“归难侨”和“归侨”两个称呼采取并用,故本文叙述时统一使用“归侨”,本文研究的对象主要是指归侨群体的第一代和第二代及其侨眷。

④被访谈人:MLS,46岁,壮族,柳城华侨农场越南归侨。访谈时间:2021年10月。

茶叶种植和水果种植的复杂技术,包括地块选择、土壤管理、施肥管理、病虫害防治、茶叶修枝与摘采等,致力于通过密集型劳动力获得更高的收益。作为当地资源利用主导方式的生产方式转型,以及大量密集型劳动力的投入,生产技术难度骤然加大,使得当地归侨在生活生产方式转型的过程中极难适应。

其三,对安置点社会支持网络匮乏的挑战。社会支持网络主要分为正式的社会支持和非正式的社会支持。正式的社会支持主要有社会结构中所能提供的支持内容,如社会保障、医疗服务等;非正式的社会支持则有家人、朋友、亲属、邻居以及社团等日常生活中的人际关系网络。柳城华侨农场分批安置来自印尼、越南的归侨,并且这些归侨的祖籍都是福建、广东和广西等地区。据笔者调查了解,早期安置的少量祖籍为福建和广东的归侨,由于在安置点较少与其他归侨互动和交流,缺乏必要的生产合作和互助,又因最初安置时未能回到祖籍地定居,而多次回到广西防城港集中安置点试图协调回到祖籍地。安置初期,即使政府为归侨提供了一系列全面的社会保障制度,但无法完全从根本上缓解和安抚部分归侨在异地他乡寻求关系和建构社会网络引发的障碍和挑战。

从柳城华侨农场归侨在安置初期状况来看,他们的初期适应主要以被动和消极为主。从地理及生态环境的突变到生活生产方式的转型,还有社会关系网络构建的困难和挑战,导致归侨在情感体验和满意程度上出现了问题,少量的归侨甚至逃离农场协调回到祖籍地。归侨在安置初期调整和适应的这一过程说明,农场的安置政策供给虽然能够对归侨发挥一定的激励作用,为归侨塑造一个新型的社会空间,降低归侨在新的生活环境中诸多方面的不确定性,缓解安置初期归侨强烈的逆向文化冲击^①。但是,归侨在回国后与祖籍国接触的初期,面对种种生活生产方面的困难和挑战,心理上还是充满焦虑、迷失和排斥,他们仍处于一种被动适应回国后所产生的强烈冲击状态。

三、计划经济时期的适度调整

1958年至1979年期间,柳城华侨农场因接待安置归侨的工作任务需要,此时的农场仍保留着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运行模式。农场的生活物资和生产资料都是统一分配,归侨的生活生产也都是由农场统一安排。高度集中的经济制度整合农场所有归侨参与农场劳动,执行严格的考勤制度,农场所有的资源配置都被纳入全场制度体系之中,无论是从事水稻种植、栽种茶叶或柑橘,还是从事其他经营生产,所有的生产成果都归农场集体所有,然后再进行统一调配。在这一经济生产过程中,农场的生产管理主要是由“户口”分配、工作分配和基本粮食的配给三种互相联系的分配系统来实现的。农场所有的生产工作都是由国家分配系统指派,归侨的日常生产生活被导入至一系列事先规定的职能任务和工作岗位。归侨传统的生产合作组织和方式逐步被以生产队为基本单位的经济组织模式所替代。当农场归侨家庭面临着国家计划经济体制的运行时,传统以扩大家庭或核心家庭为主的生产模式转向生产队生产模式,将家庭的经济行为和经济功能转交给生产队。每一个归侨家庭的需求都是完全由外在的需求标准来决定的,他们可以消费多少也是以基本的粮食配给来决定的。

当时由于农场灌溉条件较差,水稻产量低,为了改善生产条件,提高水稻的产量,县委和农场负责人经过踏勘,决定在农场东边的沿山脚下兴修一条灌溉的沟渠。农场按劳力多少,将工作任务分到各个生产队,要求定期完成。县委还抽调县里其他生产队的人来支援农场,当时来支援的大部分都是县里的小学教师和其他生产队的同志。农场归侨接到任务后,大家都开始比速度、比

^①逆向文化冲击主要是指离开旅居他乡的群体在回到祖籍国后所需要经历的文化再调适或再适应的过程。

质量,归侨们都夜以继日地干活,当时大家干活的场景现在回忆起来还是挺令人兴奋和鼓舞的^①。

为了集体出工的方便,各生产队都办了公共食堂,在那个时候叫“吃饭不要钱”的食堂,农场的职工到食堂打饭菜,驻村的工作人员或教师也到村办公共食堂就餐。有工资的职工每天大概是交5角伙食费用(访谈对象关于具体费用不确定),其他人员都不用交钱。在生产队的统一管理下,农场会将每年要完成的工作计划具体分到各个分场,当时我们九分场完成的分配任务是最多的。生产队会定期检查分场完成工作的情况,比如出勤次数、每月工作量,只有按时按量完成了这些任务才能领取工资。有的时候我们分场还要协助其他分场的职工除草、施肥,当时每周晚上生产队还要组织学习2—3个晚上,当时我们的管理是很严格的^②。

人类的经济嵌入在他的社会关系之中。他的行为动机并不在于维护占有物质财物的个人利益,而在于维护他的社会地位、社会权利、社会资产^③。在这个经济改造的过程中,农场的归侨需要将自己的经济行为和社会关系都“嵌入”生产队的日常生产和管理之中,才能适应农场日常的生活生产,这直接或间接地促使归侨要选择主动调整适应农场的生活生产方式,在农场生产队的这个共同体内维护自身的社会利益和经济利益。在这样的一个共同体中,农场的劳动分工得到保证,归侨的经济义务也必然地得到履行,实际上,计划经济制度既满足了农场实行劳动分工和再分配的需要,也充分体现了社会组织的功能。而在这种经济制度下,归侨的生产活动的动机和条件也被嵌入在这个社会的组织之中。

与此同时,归侨由于农场经营生产和劳动力配置方面存在的问题而引发不适应,如农场出现少量归侨消极怠工、责任推诿等现象。但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柳城华侨农场的大部分归侨还是选择尽快适应农场的计划经济体制。高度集中的生产模式其实是传统扩大家庭经济生产功能的另一种形式,其将劳动工具、生产资料和分配制度高度集中在共同生产的经济体制之中,这种经济体制促成了归侨必须共同合作生产,共同使用生产资料和劳动工具,以及共同分配和消费劳动产品等。因此,计划经济体制的运行促使归侨主动调整适应农场的生活生产方式,将这种生活生产方式推广到每一个归侨家庭之中,使得归侨进一步适应农场经济生产生活的同时,也增加了他们融入当地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这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归侨对农场生活生产环境的调整 and 适应。

四、“联产计酬责任制”时期的逐步适应

任何一个移民群体对环境的适应和融入都不是一个静态或一蹴而就的结果,只能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连续动态的过程。1979年,柳城华侨农场进入“联产计酬责任制”时期。1985年以后,柳城华侨农场归侨的适应机制开始发生转变,所谓的转变是归侨对安置点的环境和生活生产方式的逐渐适应,回国初期的疑惑和排斥日益消退,他们开始进入发挥群体主体性适应和融入阶段。

1979年以前,柳城华侨农场属于捧“铁饭碗”吃“大锅饭”的时期^④,这个时期农场的场员们都是以国营企业职工身份,领取固定工资,做自由的活,其不与经济效益相联系的生产体制。为了提高农场归侨的生活水平,农场从1979年起,对归侨职工按每人每月18元,非职工按每人每月12元的生活费标准发放补贴。1984年起,农场归侨的生活费标准又调整为在册职工和退休职工以及鳏寡孤独或丧失劳动力的困

①被访谈人:MLS,46岁,壮族,柳城华侨农场越南归侨。访谈时间:2021年10月。

②被访谈人:LTT,50岁,汉族,柳城华侨农场印尼归侨。访谈时间:2021年10月。

③[匈]卡尔·波兰尼,冯钢,刘阳等译:《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6页。

④董中原:《中国华侨农场史·广西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598页。

难户每人每月发补助费 20 元,其家属每人每月发 15 元^①。1989 年,农场经营的总收入达 1 425 万元,农场职工劳动生产率为 6 690 元,农场职工年均收入达 1 845 元,比 1979 年增加近 4 倍^②。通过归侨和农场职工的努力,华侨农场生产发展和职工生活水平都有显著提高,农场面貌发生较大的变化,但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当地农场还是存在亏损,相当一部分职工的生活还是比较困难。随即,为了促进华侨农场的改革和发展,从 1985 年开始,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国营华侨农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发〔1985〕26 号)通知为标志,经过多年的落实,当地政府对归侨的工作安置也在不断调整,不少归侨被安置在农场内的机关、学校或场外其他单位工作。在此政策背景下,柳城华侨农场通过归侨职工的辛勤劳动和努力生产,茶叶和柑橘的产量逐年递增,农场在 1987 年实现了扭亏为盈,电灯、自来水等基础设施已进入每家每户,改变了过去农场职工点煤油灯和肩挑水的生活状况。同时,农场建立了电视地面卫星接收站和电影院,新建了球场和图书室等基础设施。

我是从印尼回来的“侨二代”,回到中国的时候才 6、7 岁。等我满 18 岁以后,根据农场职工招工的要求,我就分配到了 7 分场工作。后来农场的效益不太好,种的柑橘都卖不出去,年成不好的时候,果园收的(收成)柑橘都很少。当时大家都是靠补贴过日子。之后,农场开始实施联产计酬责任制,农场的生产经营情况才有所好转,联产计酬责任制其实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差不多,每个家庭开始承包一定的土地,在此之前每个家庭还参与了农场土地的开垦。这样各分场的积极性就比较高了,大家都投入到种茶叶、种柑橘中,还有一部分家庭承包了田地种植水稻。虽然当时农场的种植技术还不是很成熟,但是那几年的收成和农场效益可以说比较好,大家都对这样的形式(经济制度)比较满意,主要是增加了家庭的收入,日子好过了,以前我们分场有些家庭为了家里的一点开支经常争吵,日子不好的时候家庭关系都紧张了^③。

当时农场经济不好的时候,我们都去美国,我们亲戚在那边,当时和我们一起离开印尼的。我家亲戚是卖皮衣的,那里皮衣很好卖,每天可以赚十几美元,当时我们都想去那里摆地摊,觉得在农场种水果收入太少,后来改制了,每个月可以拿到固定工资了,生活有保障了,我们慢慢地就不担心基本生活了,我当时大部分的工资主要是用来买书和家用,我们一天只工作 8 个小时,其他时间可以自由安排。之前农场亏损得厉害,后来经营好转,大家想着一起努力把钱赚回来,虽然那个时候每家的土地不多,但是大家都力往一处使,没有人计较农场收成后如何分配问题,都是希望农场效益好就可以了^④。

此次经济体制的变革对于柳城华侨农场的归侨而言是十分重要的,在农业生产方面,农场推行了“联产计酬责任制”,据农场归侨 MLS^⑤回忆:当时农场实行的联产计酬责任制其实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相似,农场的每个职工允许承包场里的 10 亩地左右,刚开始的时候每个月会给职工一定的工资。第二年开始就不给职工发放工资,并且每家每户要定期上交一定的数量的水稻和柑橘。当时大家都觉得这样的生产体制比较好,增加了大家的收入,并且也改善了农场之前柑橘亏损的状况。制度模式与行为原则其实是相互调节的,只要社会组织依照既有的轨迹运行,就不需要任何个体经济动机来发挥作用;也不需要担心任

①柳城县志编辑委员会:《柳城县志》,广州:广州出版社,1992 年版,第 64 页。

②该数据来源于作者 2021 年 10 月田野调查的统计结果。

③被访谈人:TL,59 岁,汉族,柳城华侨农场印尼归侨。访谈时间:2021 年 10 月。

④被访谈人:GRT,64 岁,汉族,柳城华侨农场印尼归侨。访谈时间:2021 年 10 月。

⑤被访谈人:MLS,46 岁,壮族,柳城华侨农场越南归侨。访谈时间:2021 年 10 月。

何人不努力；劳动分工会自动地得到保证^①。经济体制的改革激发了农场归侨的生产积极性，在此起支配作用的不是为了自己家庭之需而生产的自然秉性，而是社会行为中的分配原则。经济制度的供给不仅鼓励了农场归侨开荒和种植柑橘，赋予了归侨开发和生产的动力，而且充分保障了归侨在生产过程中的生产资料分配和产品获得。在这一过程中，归侨生产积极性的充分调动使其在经济适应过程中趋向于主动适应和融入。

此外，在这一历史发展时期，柳城华侨农场结合自身的实际和市场运作模式，根据自身的资源优势和自然环境调整管理方式，同时不会急于冒进增加投资，扩大生产，积累和保持了农场生产在市场上的竞争优势，实现了经济的复苏和发展。这在一定程度上来说，农场生产经营效益的提升和生活水平的改善，离不开农场归侨的共同参与和协助，也离不开农场归侨的敬业、勤奋和拼搏的精神。大部分的归侨在农场获得了较为稳定的发展，归侨的生产积极性也得到空前的提高。在经济层面主动适应和融入，为归侨在社会和心理或文化方面的融入提供了基础和条件。这一发展历程表明，归侨的经济适应状态已从被动调适转向主动适应，适应方式不再是依赖社会关系网络“展开”自己的经济行为，而是将其经济行为“嵌入”于当地社会关系网络之中。

五、市场深化改革时期的主动融入

制度在一个社会中的主要作用是通过建立一个人们相互作用的稳定的(但不一定是有效的)结构来减少不确定性。但是，制度的稳定性丝毫也没有否定它们是处于变迁之中的这一事实^②。1991年至1993年，柳城华侨农场开始实施以家庭承包为主，多种形式生产责任制和经济责任制的经济管理体制，农场生产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实行聘任制，根据其所聘任的职务享受相应的岗位工资待遇^③。1994年，农场根据国有企业的经营体制改革要求，开始实行场长负责制。1997年，农场以第六、八和十二分场为经营体制改革试点，实行“家庭经营、经费自理、自负盈亏，主产品由茶厂统一收购”的管理方案。2000年，农场逐步深化改革，全厂管理人员实行岗位工资制度，易岗易薪。2002年，农场生产管理实行以土地租赁经营为主的生产方式，取消水果种植联产承包制度，实行果园果树产权转让，实行土地有偿使用，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茶园生产主要实行联产承包，农场主要承担生产投资费用、养老保险费用和医疗保险费用，职工定期定额缴纳相应费用。2003年，农场成立了柳城华侨经济管理区，开始按照社会化和企业化运营。2005年，农场为了改善归侨的生活居住条件，启动了“侨居工程”建设^④，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做了进一步的改进和完善。随着柳州市工业产业的迅速发展，柳州市以柳城华侨管理区区位优势建立了柳城华侨经济开发区，将农场建设成为一个集加工制造业、物流业、旅游业和现代农业于一体的新兴产业园区，成为柳州市工业发展新的增长点。2008年，柳城华侨经济开发区修通了二级公路出口，改善了农场与周边地区的交通运输环境。

20世纪80、90年代，柳城华侨农场进入了市场自主改革阶段，农场茶叶生产迅速发展，工业生产逐渐起步，文体活动日益丰富，农场改革稳步推进，民生实惠逐年增多。在经济作物方面，1987年，农场果园、茶园面积达706.6公顷，工农业生产值突破1000万元^⑤。2005年，农场全年社会总产值3309.28万元，其中，农业总产值2115万元，职工劳动人均收入4085元，人均收入2605元^⑥。2021年，农场柑橘生产每亩利润

①[匈]卡尔·波兰尼，冯钢，刘阳等译：《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50页。

②[美]道格拉斯·C·诺思，杭行译：《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上海：格致出版社，2008年版，第7页。

③④⑤该数据来源于作者2021年10月田野调查的统计结果。

⑥董中原：《中国华侨农场史·广西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601页。

高达7000元,职工家庭年收入接近20万元^①。笔者在与农场越南归侨YZY访谈中了解:YZY曾经担任农场的农业服务中心主任,带领和指导农场职工种植各类柑橘,并且还在农场开班讲解柑橘种植的要领、经验和技能,使农场职工的种果技术得到快速提升,大家的收入也越来越高。2017年,农场的柑橘通过国家生态原产地保护认证,收购柑橘的旺季时,每户职工每天能赚几百元至千元不等的收入,农场的柑橘还会远销东南亚和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②。在劳动力配置方面,2021年农场种植户共有950户左右,农场近60%的归侨从事柑橘种植。除此之外,农场其他归侨从事饮食业、服务业、运输业、自主创业以及外出务工。如农场职工55岁的越南归侨退休职工MJH,她的女儿大学毕业后就没有选择在农场帮助家庭种植柑橘,而是到防城港找了一份私企的工作,一个月的工资为6000元。MJH的亲妹妹在农场也没有承包柑橘种植,而是在农场小学附近开了一个小商店,供应农场的日常生活所需^③。显然,农场在进行市场深化改革的进程中,农场的劳动力资源配置也发生了较大的改变,归侨的主体性意识不断增强,与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社会发展互动形式更为多元,归侨的经济生活水平也在持续提高,其经济适应状况也趋于稳定并形成良好的发展态势。

在这一经济制度的支持和推动下,农场归侨持续发挥其主观能动性,积极参与到农场的市场化经济改革浪潮中,彻底突破前几个历史发展阶段中的劳动力资源制约,进一步投入到农场的改革发展建设之中,从而将其对当地的经济适应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农场经济发展带动了当地归侨社会关系的整合,经济活动和物质资料的生产维系了归侨之间的关系和社会发展。1960年,柳城华侨农场开始陆续接收从海外归国的华侨华人,归侨的进入改变了农场及周边地区的人口结构,增加了当地的人口,同时带来了不同地域文化形态。来自不同祖籍地的归侨长期相处,共同发展农场经济,相互吸纳优秀文化,在经济文化交流融合中逐渐消弭歧见,促进了归侨之间的融合。在这一时期,农场的归侨在生产和交换中彼此交流和了解,构建相互依存的地域和社会关系,进而对当地产生了文化认同,渐次达于感情上的融合,不同祖籍地归侨的地域认同也潜移默化地存在其间。以共同生活的地域为基础,以经济活动和生产劳动相维系,归侨的文化和感情达到某种融合,其日常生活生产的社会关系得到整合,对地域和农场的经济适应趋于主动融入,便成自然之势。

结 语

柳城华侨农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特定语境下的社会经济发展,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国家安置归侨群体经济生产生活的变迁过程。对于当地归侨而言,他们归国前所受到的异国文化与祖籍国文化环境之间的碰撞和冲击,使得他们在归国初期面对祖籍国的环境时,需要一定的时间重新适应本土社会经济发展环境。这一适应过程需要我们全局考察微观个人或群体的特征和宏观社会文化的环境,考察个人和群体在不同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经济适应的具体情况。经济制度的变迁、产业结构的调整、家庭经济收入的改变以及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共同构成了归侨的经济适应状况,每一个层面的适应对于归侨群体融入祖籍国的生活生产环境都是十分重要的。

从柳城华侨农场归侨的历次适应过程来看,由国家集中安置措施、扶持补助、管理办法和发展措施等方面的构成是归侨适应农场环境的基本保障和先决条件;由生产方式、经济体制和社会网络等方面形成了归侨适应农场环境的必要条件和基本支撑;而由思想观念、日常生活生产习俗和互助交流等方面为归侨在

①③该数据来源于作者2021年10月田野调查的统计结果。

②被访谈人:YZY,52岁,汉族,柳城华侨农场越南归侨。访谈时间:2021年10月。

社会适应和心理适应上提供了主要支持,决定了归侨适应程度的核心关键。这三个方面的考察和评估决定了归侨的经济适应水平。然而,我们还必须看到,柳州华侨农场归侨在回国后的不同历史阶段的经济适应还是面临着很多问题,如身体和心理上的不适应、传统生产生活无法得以延续、如何在新的环境下生存和发展以及构建新的社会关系网络等等,这些都是归侨群体在回国后所面临的无法回避的问题。当然,我们从柳州华侨农场的经历认识到,归侨在国家经济体制和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制度的供给和资源的支撑,使得归侨群体的主体性地位和主观能动性得到较大释放和发挥,他们在特定的发展语境中不断适应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环境,紧跟时代发展的步伐,赋予不同历史发展时期群体经济适应的动态特征,这每一个历史时期的特征都充分体现了归侨对其回国后的每一个阶段生活的选择和定位,而这种主体性的选择既符合其自身的发展需求,也符合国家安置归侨的初衷和目的。

(责任编辑:郑春玲)

Study on Economic Adaptation of Returned Overseas Chinese at Liucheng in Guangxi

Luo Jiaheng

(School of Ethnology and sociology, Guangxi Minzu University, Nanning, Guangxi 530006)

Abstract: Liucheng Overseas Chinese Farm originated from the state-owned Dongquan Farm in 1958, which was originally affiliated to the agricultural reclamation system. In April 1960, Liucheng Overseas Chinese Farm was renamed as Guangxi State-owned Liucheng Overseas Chinese Farm after receiving returned overseas Chinese. The returned farm overseas Chinese have experienced the stages from hard adaptation, hard adjustment, gradual adaptation to active integration. This development experience determines the adaptation level of the returned overseas Chinese's economic life. In the specific development context, they constantly adapt to the local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keep up with the pace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 and give the dynamic characteristics of group economic adaptation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development periods.

Key words: Returned Overseas Chinese; Farm; Economy Adaptation